

现代性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国化的再造与提升

钟建华¹ 赵 斐²

(1.江西理工大学,江西 赣州 341000;2.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10036)

摘 要: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性时空交错的复杂背景中,原本存在的事件与风险性危机叠加在一起,使中国政党面临诸多的问题域。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政党现代性的再造与提升,对于中国政党来说,既要增强自觉意识,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有效结合,又要从“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正确把握政党的功能,认清时代主题的切换,实现话语叙事的调整与改变。

关键词:中国化;问题域;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01-04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国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理论的指导下,战胜了各种挫折与困难,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当下,在进行现代性建构时,既要力戒西方现代性发展向度上的异化,又要力避后现代思潮的消极影响,走出一条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现代性建构之路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促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再造与提升,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国化的实践历程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意识,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指导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最终实现了政党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并成功地把晚年马克思对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转变为现实。

1.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中国化开启

20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中华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的大任,在经过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同各种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斗争中,得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国化这个命题,那就是中

国共产党不走俄国共产党的老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走自己的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指导下苏联共产党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毛泽东曾经不无自豪地宣告: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但毛泽东后来认识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并且也深深领教了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惨痛教训之后,便在心里滋长了另外一种认识与理念,这就是不走俄国人的老路,要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走自己的路,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中国化——这个著名的命题的最终提出。“与列宁所不同的是,思想者的生存地位有着重大差异,毛泽东不是生长在一个沙俄帝国、世界中心环境中,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从边缘化的地位来探索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真理的。^[2]毛泽东是站在边缘化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立场上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系列经典文献分析和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毛泽东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共产党要根据中国社会实际主动放弃从城市包围农村的现代性政党理念,转变到从农村包围城市并取得胜利的现代性政党理

收稿日期:2010-12-15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92)

作者简介:钟建华(1967—),男,江西吉水人,副教授,硕士,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念。毛泽东整合乡村社会的军事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并借助抗日战争进一步扩展资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有利的积累规则与资源的空间和时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为获取现代性,系统整合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验与规则,成立了本土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地摆脱了对苏联共产党的模仿性,逐渐走向了自觉的现代性。

2.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生成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结合具体的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的理论与本土化结合起来,实现政党的现代性自觉意识,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也由最初的模仿和学习现代性的政党,转变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建立的和谐、稳定、合作型的特色政党制度。这种特色政党最初来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创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三三制”民主政权,主要是指当时各个阶级与团体的人员在民主政权的位置与作用。所谓“三三制”指“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3〕}“三三制”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共同纲领》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确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既区别于西方那种竞争和政党轮替、钩心斗角型政党观、政治观,又区别于一党专制和独裁的垄断型政党观、政治观。在这种特色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由于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政治基础,可以通过协商、协调各种特殊利益,合理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同时,由于具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特点的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民主理念所包含的包容、宽容和协同精神相契合,使得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获得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新时期中国政党面临的问题域

当代中国处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诸多问题中。中国政党如何从容应对全球化下遭遇的各种问题与挑战,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1. 政党的合法性面临转向与调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党开始由主要依靠意识形态资源向主要依靠

经济绩效资源的转变,不断开发执政合法性资源。将执政的经济绩效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及时弥补了意识形态资源的耗损,为中国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赢得了雄厚的经济绩效资源。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各个国家政党的政治结构体系都在进行不断调整、维护其合法性基础,充分体现了政党合法性的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中国政党如何从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实现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2. 区别于“传统政党政治”的“亚政治”的冲击

现代性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步入风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传统的政体、政策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已经发生了变化。贝克在其名著《世界风险社会》中,这种政治行为就是“亚政治”。“亚政治”,就是“社会理性拥护者”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4〕}”。这种政治的主体主要指涉为政治体系和法团体系之外的代理人,即职业团体和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和管理阶层中的技术知识界、熟练工人和公共领域中民众等,他们之间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与传统社会、经典现代性社会相比较,风险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的等级与位置的牢固关系已经被打破,并转移到了各个阶层与群体之中。正如贝克所指出的:“政党领导层都被使政治事务变得不可预测的不断增长的摇摆选民的比例所迷惑”;与此同时,公民的倡议团体和新社会运动因为市民的需要同他们在政党中的代表间的可见差距,而获得政治动力和广泛支持。^{〔5〕}所有这一切对于社群形态变化和集体特征的形态变化具有重大影响。社群中培育出许多群体与社团,他们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对传统政党政治进行反思与批判,在经济、社群和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是一种自反性的亚政治化。“亚政治”的发展将会导致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家、政党和公共权力等占据的领域逐渐被清空,让位给社会中自我生成的一些团体组织起来的亚政治群体。现代性社会中“亚政治”的发展不仅剥离了政党的传统政治功能,接管了政党控制的一些领域,同时对政党制度中权力结构的排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政党权力由纵向转向横向,由一个中心转向多中心,由统一转向分散发展的可能。

3. 新社会运动的潮起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仅欧美等国家发生了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亚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运动。与这一

社会变迁相伴而产生的是新的社会诉求、兴趣和价值,诸如环境、生态、女权、人权和动物权等则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些社会运动被学界称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新社会运动反对把纯经济增长当作社会进步标准的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加关注社会正义、价值等问题;推崇人际团,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更多的是追求个人自治,而不是物质利益和传统的政治权力。新社会运动在行动方式上既反对代议制民主,也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职业取向的科层组织方式;主张以“生态经济”、“生态财政”代替“市场经济”、“市场财政”。认为人类需要超越固执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反对“中心”、“元话语”和“宏大叙事”,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伏的现象。“新社会运动”认为,当下社会丧失了现代性深度而成为平面化状态,人与社会、自然不再追求那种历史性的深度,强调非完整性,强调表述生命、历史和时间的零散化,主张去中心的多元相对主义,提出消解等级、统一的本质主义,主张多元平等、差异的解构主义,提出消解宏大的历史主义叙事,主张微观小型的个体化、边缘化叙事模式,提出消解深度的价值主义立场,主张平面化的游戏精神,提出消解权力上的精英主义,主张参与基层民主的平民主义。可以说,“新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与磨合,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与自我发展的结果。

4.“阶级政党”的式微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由经典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尤其是新社会运动以及各种价值观的潮起,对这些国家中的政党结构及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政党体制中以社会主义政党和非社会主义政党为主导的政治上的“红—白”分野开始被打破。传统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斗争”观念也悄悄退场。这样一来,传统的以某一阶级作为其相对稳定的支持来源、长期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旗帜”的“阶级政党”,逐渐让位于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功利性和灵活性的生态性政党。欧洲一些国家传统型的工人阶级、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各个阶级、阶层划分的界限日趋模糊,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很难说明当前欧洲社会阶级的变迁。可以说阶级分野的式微是与后现代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也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党支持者在阶级构成上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政党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已经并正在改变,这一基础不再

是传统政党那样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核心阶级群体,而是在阶级来源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如今,选民投票支持哪个政党一般较少关注该党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该党在相关政治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主张的符合程度,关注具体的、贴近的现实问题。政党分野由当初以阶级为基础的分野开始向以议题为基础的分野转变。

三、中国政党现代性的再造与提升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完成,与此同时却遭遇现代性异化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双重冲击,面对此境遇,要使中国实现不同于在旧全球化时代韦伯所倡导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关键在于如何再造与提升中国政党的现代性。

1. 时代主题的切换与话语叙事的改变

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因为只有人才能构成现实的社会,没有了人,便没有了社会。当前,中央集体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伟大成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与追求,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话语由启蒙、解放转化为有效的社会指导与治理。中国共产党在主导话语权的过程中,既考虑到当今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实际状况,又考虑到中国社会目前变化的综合情况,秉持着合法性与世俗化价值原则,适时调整、修缮和整合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资源,尤其是对政绩合法性进行补充与完善,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又要创建新的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一些政党对话与交流中显示出独特的中国气度与作风。全球化过程中,许多主题发生了多次重大切换,其中比较鲜明和典型的是以经济与发展为轴心的元叙事转向以发展与和谐为中心的主张人与人和谐的多元叙事。因为任何社会发展最终要通过人的发展体现出来,社会之所以能永远向前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符合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的创造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2. 坚持从“三重性”的角度给予把握与提升

当下,中国共产党治理面临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加强中国政党的现代性建设,一定要结合当前社会实际状况,从“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给予把握与提升,并将三者完整地结合起来。从结构性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共产党制度的结构

主要表现为：“一”(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多”(主体的多元性)的统一。因此,中国政党兼有一党制的保持政治稳定和多党制(包括两党制)的促进政治发展等结构性功能;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形成于历史,更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进行调整、发展与完善。世界各国政党发展表现出的普遍性特质表明,为了搞好执政,在面对实际发展遇到的问题,政党的政策更要灵活和务实,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和适应性,要有利于今后审时度势修订或制订新的政策,同时还要在党内外建立灵活实用的多方面协调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既反映了现实进程中政党自开始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同时也体现了探索适合现实需要的政党制度的曲折的历时性;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政党是生存于社会多重领域之中的,事实上,社会交换域、交易域、组织场以及政治域等组成了实际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且各领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因而各个领域发展出来的制度相互也是关联在一起的,并且在博弈均衡的状态下,各个制度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的。政党制度的共时性特点就是通过这样的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出来的。政党政治就是分别围绕国家、社会以权力为中轴而展开的政治活动,不仅组成了一种“共时性”的层级架构,而且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政党之间都发生了共时性关系。历史上的每一个“今天”,都在提供这样的政治事件;当下的每一个事情,都蕴涵着复杂的共时性交错的线索。中国政党如何超越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构建新现代性,并承担科学发展的重大职责,不仅仅要从中国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性经验中汲取教训,而且还将从全球维度中,保持价值多元与价值普遍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3. 实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优化组合

现代性体现着政党制度的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能力与属性。现代性不仅促进了民众对于政党的制度化要求进一步提高,促进政党制度严格按照有关法治程序进行规范性和有序性的政治活动,从而避免社会秩序的动荡;同时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参与扩大,巩固和提高了政党的合法性支持与政治认同。而民族性则体现的是一种政党制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以及风俗习惯。民族性能够为政党制度提供一定的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认同与

支持。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这是一个既牵涉现代社会发展,又涉及民族感情和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对现代性与民族性进行调运与融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这与政党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现代性意识有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党本身能否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政党,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现代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历史继承性既可以减轻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又可以为政党在制度的震荡中提供稳定性维护与支持。但对传统的作用发挥,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的越界行动,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造成政党的保守与退化。一定要理性地利用为中国政党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性,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最重要的条件。对于中国政党来说,要积极发掘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之与中国的现代性政治发展相适应,特别是要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和而不同的思想价值理念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并把它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民族和文化支撑,增强全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中国政党于再造和提升的过程中,要积极吸收现代民主普遍性质资的同时又要特别注意克服民族性中的消极和保守的因素,进而实现政党制度现代化,自觉地坚持走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路径。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2]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4.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
- [4]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50.
-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34.